

重识穿梭异文化空间的人物

——以梁启超、王国维、傅斯年为例

黄进兴

兰克的史学在世纪之际的欧洲或德国，均面临强敌环伺，四面楚歌的窘境；但若干治史的精神，尤其对异文化的造访者却仍是新颖可喜。

近年来，大陆对文史资料的整理和开发，成绩丰硕，使得不少学术议题获得较精细和准确的认识。单以个人所关注的史学方面，华东师范大学的史学史长久累积的工作，便令人印象深刻。在台湾由于先天资料的残缺，恒受“文献不足征”之患，举其例：个人在探讨“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感受特别深刻；主要在本地幸存的近代教科书甚为有限，取证并不容易。故对近年大陆累积的史学研究工作更是歆羡不已。

但在此得之不易的实证基础之上，如何再推进或扩大其研究成果，乃是时常萦绕于个人脑海中的思虑。倘若“知己知彼”乃是周全掌握历史问题的不二法门，那么除了广泛搜集各方中文材料之外，“知彼”仍有其必要，是故了解跨文化人物身处彼方的文化情境不可或缺。必须先行一提的，先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教授多年前于其比较思想史的典范之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1964)，业已充分展现此一进路的手法。按，史华慈教授缘融通中西思想史，故能独具慧眼，特别提示严复赴英进修时，并非纯然一张白纸，而是带有先入为主的眼光，对西方经典进行独特的阅读和诠释；而经由史氏比西方原典和严氏的中文译作之后，他梳理出严氏理解的差异和文化意涵。而获得前贤前所未发的睿见，令人耳目一新。

另以个人近年所摸索过的三个个案：梁启超、王国维、傅斯年为例。三位皆有沉浸异文化的经验，复恰巧与兰克史学有着程度深浅不一的关系，谨略予阐述如下：

首先，以梁启超(1873—1929)为例。梁氏治学博通中外古今，曾数度滞留东瀛，后更曾远赴欧美考察。综观梁氏一生的政治与理念，尝历数变，他不讳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此一评语施之史学发展亦不差。

本世纪之初，扶桑人士狭间直树挟地利之便，集众人之智，

群策群力，探究梁氏思想形成的日本渊源，成绩可观，颇可借鉴。此外，上世纪之末，个人亦不揣简陋对梁氏史学稍作探索，兹简述于下；在史学史上，梁氏素被视为中国新史学的肇基者，尤以《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一书闻名于世。衡诸事实，以影响力之广泛，梁著显然无人可及。致连当年视梁氏为学术劲敌的胡适(1891—1962)均称许本书为“任公的最佳作”，遑论其他。那么梁氏独特的吸引力与贡献何在呢？

按梁氏早期曾数度滞日，甚受该地文化及学术氛围的熏陶，思虑为之大变。因此了解该时的思想情境，当有助于了解梁氏思想的形成背景。一如前人所述，梁著所涵摄的史学原则实本诸西学史识。个人便曾撷取日本汉学大家桑原鹭藏(1871—1931)对梁氏代表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书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适可折射出梁氏史学的意涵。

整体而言，桑原氏甚为肯定本书的学术价值，且相信此书对中国史学的革新定起作用。惟衡诸日本史学界，凡是熟读德人伯伦汉(Ernst Bernheim, 1850—1942)的《史学入门》(1905)或日人坪井博士《史学研究法》(刊于1903)等书的人，本书便无参考的必要。但他随下一转语，梁氏书中所旁征博引的中国史例，却是它书绝无仅有，因此凡是专攻中国史的学者均应多加重视。要知桑氏素不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有此嘉许委实不易。桑原氏的评论必须加予覆按，方能切中个中实情。

日本留心西洋史学较中国为早。1887年，德国兰克(Leopold Ranke, 1795—1886)学派的门徒律斯(Ludwig Riess, 1861—1928)已开始东京帝大传授日耳曼史学。随后，日籍留欧学生陆续返国，以东大为据点，教授严谨的史料批评。当时西洋史家奉德国史学为圭臬，日本史学在西化的过程亦难免呈现同样的征象。桑原氏提及的坪井博士即为上述的代表人物。坪井氏的全名为坪井九马三(1859—1936)，早年留欧，深受德国史学影响。返国后，长年任教东京帝国大学，传授史学方法

与政治外交史。乃是日本兰克史学的掌旗者。

桑原氏所提的另位学者伯伦汉则是德国史学方法的集大成者。1889年，他所发表的《历史方法论与历史哲学》(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素被公认为兰克史学的结晶。在西洋史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兰克史学的敌对者兰布什特(Karl Lamprecht, 1856—1915)即说：“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即是伏尔泰(Voltaire)、伯伦汉与我自己。”由此可见一斑。]桑原氏所说的《史学入门》，顾名思义应是该氏刊行于1905年的《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一书。该书浅显易晓，曾有“岩波文库”日译本。桑原氏之评不啻意谓：梁氏一书所表彰的史学原理不逾伯伦汉的系统。

复次，潜心史学有年的杜维运教授亦指出梁氏一书的历史概念颇有借鉴《史学原论》之处。按该书作者朗格诺瓦(Charles V. Langlois, 1863—1929)与赛格诺博(Charles Seignobos, 1854—1942)咸为法国日耳曼史学的再传弟子。在法国史学界，《史学原论》享有与伯伦汉著作同等的地位。由于道出同源，它们均可视为兰克史学在方法论上最终的陈述。是故，无论梁氏史学确切源自何处，恐与当时的西方史学脱不了关系。杜氏之后，复有郭国义先生进而指出梁氏原初新史学的概念颇有取资日人浮田和民(1859—1946)《史学通论》之处。按浮田和民曾留学耶鲁大学，该时适是“兰克科学史学”风行美国之时。他和坪井九马三素被目为世纪之际两位日本兰克史学的鼓吹者。概言之，杜、郭两位的立论盖立基于文本之间的校勘和比对，恰与桑氏一语中的的实质论断，可前后呼应，相得益彰。

然而仅凭传播西学尚不足以解释梁著成功的理由，否则西学造詣尤佳的何炳松、杨鸿烈(1903—1977)诸人的史著，理应略胜一筹，事实上日后反倒隐没无闻。这时桑原鹭藏对梁氏国史造詣的推崇就有些启发性。梁氏文史涵养博洽融通，高人一等，

能令中外学问水乳交融，毫未见窒碍之处。这项移植工作看似平常，实则绝难；以致后来的学者固然在理论层面能够推陈出新，惟在事理圆融一方，犹瞠乎其左。换言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普受瞩目，历久未衰，便是能将西方史学与国史知识溶铸一炉，这项成就迄今仍罕与伦比。职是之故，桑原氏的两点评论揆诸日后发展，盖洞烛先机，发人深省。

另以王国维(1877—1927)为例。王氏早年与西方哲学的搏斗，乃是后人津津乐道的壮举，但三十之后，却毅然决然舍弃西学的追求，转而专攻国学，果不其然造就了一番伟业；而为后人所向往，欣羡不已。但他个人治学的转向和决裂，却不经意留下一个亟待索解的学术公案。因此若无直接取证康德哲学的文本，便无由掌握这段时期王氏的思路与变化。而往昔的处理，常令人有隔靴搔痒的感觉。盖史家往往回避取阅康德的著作。

诚然，康德的哲学著作素称难读，概念抽象且繁复，不只哲学工作者视为畏途，更遑论实证取向的史学家。但俗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若不能直接亲炙其作品，终究仿若古人所讥刺的“对塔说相轮”了。

要言之，王国维之接触哲学纯系偶然。他与康德哲学四回搏斗的故事，学界早已耳熟能详，最后他系通过叔本华的阐释，方得其要旨。之前，王氏固然于康德的论旨略有所悉，但于康德文本本身繁复的论证程序，似一时难以掌握。但整体而言，王氏对德意志观念论的认识，是假道当时日本学界。要知日本学界接受德国哲学颇早于中国，其时康德与叔本华思想渐次风行。概言之，康德的“批判哲学”(critical philosophy)向被视为西方哲学的“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将原本被奉为一种基本及普遍论说的形上学(metaphysics)，转化为一种“认识论”(epistemology)的利器，且超脱传统形上学本体论的形式。这一点王国维深得三昧，例如他曾断言：“彼(汗德)憬然于形而

上学之不可能，而欲以知识论易形而上学。”在重新阐释及评估传统中国哲学议题，他遂亦步亦趋，取法康德的“批判哲学”，以“先天辩证法”(transcendental dialectic)的技巧，解消了传统中国哲学的命题。他撷取中国哲学论述最多的三个概念：“性”、“理”、“命”，予以别出心裁的阐述，而撰述了《论性》《释理》《原命》三种不同凡响的文本。

他所持的高见，乃系得自康德的教诲——切勿混淆“形上”与“经验”不同范畴的论述。职是他特为表彰，使后之学者勿徒为此“无益之议论”。这在当时确是石破天惊的立论。惟得一提的，王国维于《三十自序》里，毫不讳言，尝因读《纯粹理性批判》至“先天分析论”(transcendental

(下转3版) ➔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李纯一 lc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封面图片：

原定今年6月底在英国V&A博物馆开幕的爱丽丝年度展现已推迟。今日我们所熟悉的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形象，都是由约翰·坦尼尔爵士(1820—1914)创作的。今年也是坦尼尔诞辰200年。图为1930年C.F.A.沃伊齐根据坦尼尔的插画设计的织物纹样，现藏V&A博物馆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匯學人

